

教育部重大项目成果

■ 张国良 主编

总报告

Chines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中国发展传播学

■ 徐晖明 著

教育部重大项目成果

张国良 主编

中国发展传播学·总报告

徐晖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传播学·总报告 / 张国良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308-05060-9

I. 中… II. 张… III. 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716 号

中国发展传播学·总报告

张国良 主编

策划编辑 徐 婵

责任编辑 李海燕

文字编辑 徐 婵

封面设计 刘依群 葛丽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9.25

字 数 2308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060-9

定 价 265.00 元(共九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总 序

张国良

大约 6 年前,也就是 2002 年下半年,由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CHINES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简称 CDC)正式启动。其研究设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开展一项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旨在考察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经过反复讨论、细致规划,我们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研究团队,于 2002 年底、2003 年初,分头奔赴全国八个省份,实施了入户调查,同时,还对当地主要报纸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领导访谈。在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后,各团队成员又投入了紧张的统计分析和报告撰写中,经过 3~4 个寒暑的辛劳,陆续完稿,最终交出这样一份总篇幅逾 200 万字的答卷。

回首往事,颇为感慨!这一项目的背景如下:

世纪之交,为了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了一百多个“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严格评审,由我担任主任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被批准为全国传播学科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基地的主要职责,是持续地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于是,本人申报的“中国发展传播学”被确立为首批重大课题之一。

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发展自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因此,诸如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伦理学等,无不构成学科关注的热点。但遗憾的是,由于传播学在中国起步很晚,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步,基础很弱,短短 30 年里,又历经各种曲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获得长足发展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以传播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传播学,也就一直处于缺失、贫弱的状态之中。

我之所以构想、申报上述项目,初衷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我看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不对本土的发展问题予以足够注意,那无疑是失职。而这一项目当年很快就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及专家的审核,则又表明,对发展传播学的重视,业已成为共识。

从时间角度看,2002 年恰好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和实质意义的节点。它是改革开放的第 25 个年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一方面,2001 年底加入 WTO(即“世界贸易组织”)的举措,使中国真正融入了

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2002年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均约8000元，接近1000美元（2003年实现了超越），也就是说，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跨入了小康阶段，并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不仅如此，2002年又处于新媒体大发展的前夜。该年，中国广告业的产值近1000亿元，而整个媒体产业的总产值近2500亿元，总体呈现出蓬勃生长、方兴未艾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新兴媒体已悄然崛起，开始形成对传统媒体的强力冲击，以最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为例，2002年其用户已超过4500万人，跃居世界第二。

综上所述，在此历史关节点上展开的“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概而言之：

第一，作为历史实录的文献，它通过定量方法，以数据和事实文本的方式，忠实地描述、记录了这一关键时刻中国传播产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状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史料性。

第二，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它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资料，并且给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结论，据此，既可纵向比较，又可横向对照；既可深化认识，又可凝练理论。

第三，作为工作改进的依据，它发现了媒介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不足，诸如：媒介设施的城乡差距显著、重要议题的深度认知率低下、揭露坏人坏事不够有力、反映群众呼声不够充分、品位格调不高等等，其中的绝大部分意见，至今仍不失参考作用。而且，尤需注意的是，除了全国层面上的一些共同症结外，各地的问题其实又不尽相同，为此，本项目的最终成果，以一个总报告和八个分报告的形式，加以全面、具体地呈现。

由于这是一项面向全国的大规模、综合性、实证性的研究，工作量堪称浩大。就问卷调查而言，覆盖了东、中、西部八个省份（约4.5亿人口），从最北部的黑龙江省、甘肃省，到最南部的云南省、广东省，从大都市、中小城镇到乡村，纵横以千万里程计，跋涉于山水阡陌间，访问样本家庭近3000户、人数逾万。就内容分析而言，选取各地32种报纸（为期两周），合计400多份，统计、分析了约25000条新闻信息。如此繁重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若非得到了各地兄弟院系师生的鼎力支持（动员人力500人次以上），其完工根本难以想象。

在此，作为这一重大课题的总负责人、系列丛书的主编，本人谨向全体为CDC项目做出各种贡献的人士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当中包括：李双龙、廖圣清、韩纲、李兆丰、朱春阳、郑征予、严三九等。

对于以下直接参与书稿写作的人员，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是：徐晖

明(总报告、广东卷)、王迪(黑龙江卷)、郑西帆(浙江卷)、王玲宁(河南卷)、郑智斌(江西卷)、禹卫华(四川卷)、郭建斌、曹云雯(云南卷)、姚君喜(甘肃卷)。

最后,衷心地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本研究项目和本系列丛书的“慧眼识珠”,尤其是责任编辑徐婵女士的睿智、耐心和宽容,使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 尽管其必然还存在各种缺陷,期待广大读者的指正,但无论如何,作为撰写“中国发展传播学”历史长卷中的一页的尝试,我们尽力了,也问心无愧了。

2008 岁末

于沪上文化花园明珠苑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总体状况	14
第一节 调查方案与实施	14
第二节 调查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17
第三节 样本的个人特征	20
第四节 受访者拥有媒介的情况	24
第二章 受众与媒介	26
第一节 大众传播在闲暇中的重要性	26
第二节 四大媒介的使用情况比较	30
第三节 受众接触三大媒介的内容	33
第四节 受众接触三大媒介的动机与满足程度	44
第五节 受众对三大媒介的评价	48
第六节 互联网接触情况	52
第七节 非新闻类媒介接触情况	56
第八节 受众与议题	59
第九节 小结	63
第三章 个人特征、媒介与观念	65
第一节 教育程度与媒介行为	68
第二节 居住地与媒介行为	76
第三节 性别与媒介行为	84
第四节 媒介接触与观念现代化	92
第五节 小结	100

第四章 媒介内容分析	
——以报纸为例	102
第一节 研究方法	102
第二节 媒介报道的主题	105
第三节 媒介报道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	112
第四节 媒介报道角色的性别	116
第五节 小结	121
结束语 中国社会系统中的大众传播	129
附录 “国家发展与大众传播”调查问卷	136
参考文献	152
后记	154

导论

一、理论背景

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发展传播学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美国学者勒纳在 1958 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为标志。这一学科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2 年,获“国际传播协会”(ICA)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八个研究专题小组之一。

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①“广义地讲,发展传播学就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传播的原理和实践。”“发展传播是一种有目的的传播。换句话说,发展传播者设立一个具有特殊目的的传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传播的目的与预期的变化和目标相关。”^②

从世界各地发展传播研究的历史来看,它其实是一种“思路”、“视角”,而不是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严格说来,它并没有自己的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比如,它看起来经常是将效果研究、受众研究、传播者研究等等糅合在一块,它所用的方法既有实证的,也有阐释的;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虽然,有些研究者乐于提到发展传播学的“范式”及其演变过程,但这种范式仍然是研究的“思路”和“视角”的转换。与较早盛行起来的与五个 W 相对应的传播者研究、媒介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发展传播学更多地不是从传播过程、传播机制的内部来研究传播,而是将传播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之中,纳入社会发展的整体背景,将传播视为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以了解它对于社会的作

① S. T. Kwame Boafo(1985): Utiliz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frican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 Africa), *Gazette* 35: p. 83.

② 潘玉鹏:《发展传播学简介》,载《新闻大学》1989 年冬季号。

用。为此,发展传播研究较多地采用宏观角度(有时即使是微观的研究,但也联系到宏观背景),注重研究的实际社会功用。

具体来说,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大致有两个层次:理论框架研究和实证研究,前者建立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宏观视角,关注传播对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推动作用,以及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后者具体考察传播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专题性的研究,例如性别与传播、健康传播、国际发展传播项目的实施成效、新传播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传播与传统文化、发展传播中的公众参与、乡村地区的传播等。在过去数十年里,一些发达国家以及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但致力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和有关国际机构、民间组织或当地政府一道努力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过诸多发展传播项目,筹集资金、推广技术、培训人员、组织讨论、监管项目、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等,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由于发展传播实践在不断提供新的体验,再加上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相应地,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发展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或称主导范式)、对于主导范式进行修正后的新范式以及发展传播学的批判理论。

二、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我国,发展传播学这个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根据对中国几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刊物的检索,^①这一时期直接研究或介绍发展传播学的文章仅有两篇:《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国际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袁路阳,载《新闻学刊》1986年第1期);《发展传播学简介》(潘玉鹏,载《新闻大学》1989年冬季号)。这两篇文章是中国学者对发展传播学的最早介绍,但比较简单,甚至未能触及到发展传播学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观点。

1987年7月20日至8月1日,在美国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召开的关于“传播与社会变迁”的讨论会上,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就新时期的传播这一议题发表论文,《国际新闻界》摘译了这

^① 检索范围:《现代传播》(含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至2001年第6期,《国际新闻界》1980年第1期至2001年第6期,《新闻大学》1981年第1期至2001年冬季号,《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至2001年第4期,《新闻研究资料》1979年第1辑至1991年第56辑,《新闻学刊》1985年第1期至1989年第2期。

篇论文的部分内容,以《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研究现状》为题刊登于1988年第4期。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活动是,1988年9月13—16日,由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所在上海联合举办的“中国城乡文化观念变革”研讨会。东西方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所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基地,20世纪70年代施拉姆曾任该所所长。这次研讨会,以上海市区十个区和郊县青浦农村实施“上海城乡文化观念变革抽样调查”的第一批定量统计数据为中心展开讨论。此前,于1987年10—12月,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与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合作,对上述地区进行了抽样人数样本为2000人的问卷调查,并利用电脑对调查数据展开了分析。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代表认为,文化观念及其变革的调查与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新兴的热门话题,描述特定地区人群的文化观念现状,揭示其变化轨迹并探讨其内在规律,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中的主体——人,以及人的观念更新、人的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的发展传播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表现为:

(1)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观点以及理论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并开始关注发展传播学理论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进展,这方面的论文有范东生的《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载《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3期),支庭荣的《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陈龙的《“发展理论”演进中的媒介角色及其再认识》(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1期),杨瑞明的《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意义》(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殷晓蓉的《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以及吴予敏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载《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等。译著则有《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

(2)在实证研究方面,开始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本土情况的研究,进行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调查,一些较大规模的课题得以开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些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着手的研究,中间因故停顿,到90年代重新得以进行。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大众媒介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王怡红,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0辑,1990年),《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闵大洪、

陈崇山,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5辑,1991年),以及《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分析》(张学洪,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7辑,1992年)等。著作有《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媒介·人·现代化》、《传播与民族发展》、《大众传媒与农村》等。

1990年,《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中译本出版(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这部发表于1964年的著作,是发展传播学早期经典著作之一,对后来的发展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研究都没有模仿施拉姆研究的方法,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利用了施拉姆研究的思想观点”^①。

施拉姆的这部著作从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出发,指出它可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项目中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并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事业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改进传播以支持国家发展的若干建议,比较具体地论述了传播学理论对于发展问题的特殊意义。书中还较早地注意到了全球的信息流通不平等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势必加剧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也同样存在。

1992年,“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出版(《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编,新华出版社)。这个项目开始于198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牵头,课题组长为邱颂东,副组长为范东生(祝建华参加了早期的研究工作),组织全国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这是一项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涉及中国新闻事业的总体发展方针、政策、法规,多种媒介的均衡发展,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及新闻传播与受众观念现代化的研究。

1993年,裘正义出版其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群言出版社)。这是“七五”国家哲社重点项目“传播与中国城乡现代化”的主要成果,论文得到美国东西方中心专家的指导。这是中国大陆在发展传播学领域迄今为止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首次在一个完整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下进行了大规模、综合性的实证研究,如大陆传播学者们一直期待的那样,将来自发达国家的传播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这里的传播学理论主要指“发展传播学”理论框架);就其受众调查的规模而

^① 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4页。

言,抽样调查的范围覆盖9个省(第二项因故压缩为3个省),包括了发达地区、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三类不同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区。

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乡村地区大众传播与发展功能的三项相对独立的实证研究,第一项为“中国乡村地区居民传播行为研究”,样本数1800人,第二项为“乡村地区发展消息传播过程与效果研究”,样本数1200人,第三项是“乡村地区大众媒介支持发展功能研究”,样本数1800人,这三项研究都分别包括研究背景、调查方法、理论框架与假说、资料分析、结论与建议等几个方面。在三项调查的基础上,作者对中国乡村地区传播现状作出了如下的总体定性描述:“低需求层次及与此相应的低期望值的低度满足。”^①并对中国乡村发展传播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对乡村发展传播与文化建设进行了专题分析。

作者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在对这三类地区的乡村居民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在现代化程度方面的落差大于在传播行为方面的落差,为解释这一现象,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观念的层次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观念是多层次的,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1)浅层观念或价值观念,(2)深层观念或文化观念。前者易改变,后者难改变,而传播行为常常只改变了前者,因而有可能出现“观念领先、实践后滞”的情况,但作者没有对此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和解释。

1997年,《媒介·人·现代化》(陈崇山、孙五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着眼点是,“在我国的特定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他因素不是这项研究的中心内容”。^②这个问题无疑是极有意义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例如《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现状调查》(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载《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张学洪,载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等。传播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一直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为确立发展传播学经典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都十分重视传播对于促进人的现代化的作用。

《媒介·人·现代化》的作者一方面进行了几项较大规模的调查(包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以及浙江、北京和厦门的儿童调查),另一方面充分

① 袁正义:《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群言出版社1993年3月,第214页。

② 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4—5页。

运用了以往由不同部门或单位在不同时期进行的一些抽样调查,对其展开再分析。该书试图对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作出比较全面的考察,其实证方面的内容包括:我国受众媒介接触的若干人口特征、受众接触媒介行为与观念现代化、媒介内容偏好与人的现代化、受众媒介观念、人际交往和大众媒介的共同作用以及传播与儿童的现代化等,在同类研究中最具广泛性,其数据分析方法也较为规范。这项研究的主题原为《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后来在实际操作中改为《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主题的变动难免使调查的一致性受到影响。再加上大量使用以前的调查资料,前后几次抽样调查并无统一的计划 and 目标,因而在问卷指标体系设计、抽样方法、样本代表性、地域覆盖范围等方面,各组数据有不尽一致之处,有可能影响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

2000年,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的成果《传播与民族发展》(张宇丹主编,新华出版社)出版。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信息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查抽样中包括了占云南省少数民族总人口96.25%的13个民族。调查的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且不同民族之间的信息化程度悬殊,作者据此提出了改进的对策。

这项研究表明,有些发展传播学者正在从一般化的受众调查进入更加专门化的新领域,开始关注以前较少为人注意的某些特别地域或族群。从世界发展传播学的发展过程看,初期主要是提出理论假设,较多关注宏观方面的问题,如传播活动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尤指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有多大,以及这种作用如何发生等,后来才出现更多的中观或微观研究,例如以某个特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社群为观察对象,就某一特定“专题”进行研究。中国大陆的发展传播学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变。

按照作者的观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现状颇为严峻,作者将其描述为:(1)大众传播媒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知识启蒙的重任;(2)大众传媒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未能有效地担负起观念引导的作用;(3)大众传媒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众行为的影响微弱;(4)大众传媒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①

这项研究的框架完整,取得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数据资料。在方法上,

^① 张宇丹主编:《传播与民族发展》,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3页。

使用了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以及个案研究方法。但是,在数据资料的分析解读,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等方面还有不够规范和严谨的地方。

离本研究较近的一项研究成果,是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研究实际上是对江苏农村(主要是苏南)的研究,探讨了江苏农村居民的媒介行为,并详细考察了经济信息对于江苏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与当地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是继《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之后又一项专门针对农村的系统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实证研究,有的并未声明在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框架下进行,但其涉及的问题正属于发展传播学关心的范围,或者说,其本身可视为发展传播学框架中的一项专题研究,例如有关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媒介与性别的问题等。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发展传播学领域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无论是理论框架的分析和介绍,还是结合中国大陆开展的实证研究,都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仍属于起步阶段。

具体说来,中国发展传播学的成绩表现为:

(1)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就是说,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从理论的引进、介绍转入结合实际、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传播学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2)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社会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资料。这些资料的价值是长期的,有利于进行较长时间跨度的研究。

(3)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除传统上应用较多的定性研究之外,抽样调查、数据统计等形式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是发展传播学的重要方法,中国的发展传播学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积累了一定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发展传播学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关注和参与这一领域的学者还不多;对国外近年来发展传播学的情况了解不多,也不够细致;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处于积累原始资料的阶段,暂时还难以从中抽象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深度的理论;等等。但就目前来说,最明显的不足仍是研究方法不够成熟,具体表现为:

(1)在数据资料的处理方面,对于数据包含的实质性意义理解不够,因而有时只停留于数据的罗列,以及过于简单化的数据分析,导致研究结果不够深入。

(2)对数据的解释不够严谨,过于随意,例如,按照自己的理解,或为了能纳入一定的“框架”之中,而作出超越数据以外的引申、发挥,让数据

成为证明自己的既定观念的工具,这是与实证研究方法强调客观性的特点不相符的。

(3)方法仍比较单一,在较多地应用定量方法的同时,对定性方法有所忽略;在重视抽样调查法的同时,对实验法、田野观察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历史/比较法等应用不够。

纵观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演进,早期的理论单纯而明了,具有理想色彩:“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大众传播确实可以对国民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①“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②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主导范式的没落”与新一代范式的兴起,实际上是对早期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修正,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并无一个“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从而强调发展传播实践要从“本土”、“本地”出发,与当地文化传统相结合,采取适应当地情况的措施;20世纪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的急剧变化,诸多新传播技术如卫星广播、互联网等的应用,以及有关“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更将发展传播学理论纳入一个更为宏大、复杂的背景之中,发展传播学本身也因此不断地获得新的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传播学既要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为本国的实践服务,又要放眼世界,批判地吸收各国发展传播学的最新成果,为这个领域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稿试图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前进。

三、本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1. 本书稿的内容

本书稿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的成果之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受众的媒介行为的一般性研究,包括受众接触的媒介种类、频度、内容、动机与满足程度、对媒介的评价等。

这里的所谓“媒介行为”,可能是一个不尽准确的概念,因为严格说来,动机、满足程度等,属于心理学范畴,而非“行为”,但事实上,心理现象

① [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

② [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最终也将以行为的方式体现出来。为方便起见,笔者把受众与媒介之间发生联系的整个过程,都称为媒介行为。

(2)对受众的媒介行为与个人特征的关系的研究,包括受众的媒介行为与教育程度、居住地、性别的关系,以及媒介、受众、观念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3)对媒介报道的内容研究,包括对报道内容主题的分析,以及对报道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分析。

2. 本书稿的贡献

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无外乎探索、描述、解释或评价。而本书稿重在描述,也涉及解释和探索。

虽然,因笔者能力所限,本书稿未作出较详尽的理论阐述,但它的基本框架显示了笔者的努力方向:以描述我国大众传播的基本图景为主,以解释其原因为辅,同时,在分析本次调查的数据、与以往研究对比时,力图发现和揭示新的问题,这属于探索性的工作。

作为一项实证研究,在试图对大众传播作出描述时,涉及面如此之广,意义何在呢?

相对而言,以往的同类研究,大都是局部性的探索,或局限于一地(如某省),或侧重于某类居民(如农村居民),或只涉及大众传播的某个方面(如观念现代化)。这些研究本身自有其价值,但也因为它们局部性,在讨论问题时可能更多地关注一点,而不及其余,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就本研究而言,一方面有自己的基本方向,即对我国大众传播的现状作出描述,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发现;另一方面,本文不断地与已有的同类研究展开各个方面的比较,以进一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本研究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之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就规模而言,依托了迄今为止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中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一次抽样调查。调查在全国九个省市展开,涵盖东部、中部、西部,大城市、中小城镇、农村,入户访问了 2830 个样本,访问了 50 多位媒介负责人,并对全国各地的 30 多份报纸进行了分析。

(2)就内容而言,力图在充分利用原有的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大众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现象(如受众的媒介行为、媒介行为与个人特征的关系、媒介如何进行报道等)作出描述和解释。

本书稿的结构体现出这样一种意味:将大众传播的各个环节,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即社会总系统之中来考察,而不仅仅从传播过程的内